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质量评价

周 波,王英家

(东北财经大学 财税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摘 要:**改革开放 30 余年来,以快速经济增长速度为支撑,我国经济增长取得巨大成就,经济规模迅速壮大,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但从经济增长质量角度衡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健全相耦合,我国经济增长呈现规模速度粗放型模式,需求结构失衡,产业结构失调,能源资源和环境代价巨大,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创新不足,成为实现“两个百年”战略目标的现实制约因素。新常态下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应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善用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突出创新和人力资本驱动。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规模;经济增长质量;评价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 - 929X(2016)03 - 0019 - 12

## 1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经济增长成就

### 1.1 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点分析

肇始于改革开放战略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释放的巨大生产力,以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衡量,1978 - 2014 年间我国经济增长率高达约 15.6%。由此,我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继日本和韩国后长期保持较快增长的国家。以快速经济增长速度为支撑,我国经济规模迅速壮大(如表 1)。分析我国 GDP 增长状况的关键点,可以发现,继 1986 年我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0 308.8 亿突破 1 万亿后,2001 年达到 110 270.4 亿突破 10 万亿;此后,自 2006 年起每隔两年就完成 10 万亿级的国内生产总值攀升。剔除物价影响,以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衡量,1987 年和 2001 年分别突破万亿和 10 万亿,2006、2009、2011 和 2012 年递次以 10 万亿级增长。

修回日期:2016 - 03 - 0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非线性财政货币政策规则:基于中国的模型、实证和政策引申”(7100301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财政货币政策宏观经济绩效评价和政策设计:中国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视角的理论模型、实证检验和政策意涵”(71273043);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科技人才支持计划“财政货币政策宏观经济绩效评价方法及我国的政策设计应用”(WR2013009);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培育经费资助(辽百千万立项[2015]63 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五十一批面上资助项目“基于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宏观绩效评价与政策设计”(2012M510654);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L11DJL047);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科研项目(DUFE2014J06)。

**作者简介:**周波,男,内蒙赤峰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博士后,东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财政货币政策宏观经济绩效评价和政策设计,Email:yourab@163.com;王英家,男,河北衡水人,东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财政政策。



表 1 中国以 GDP 衡量的经济增长状况一览 单位:亿元,元,%

年份	GDP	实际 GDP	实际人均 GDP	产出缺口
1978	3650.2	3624.8	379.1	0.473
1979	4067.7	3991.8	412.0	0.358
1980	4551.6	4234.0	431.5	0.239
1981	4898.2	4778.7	480.8	0.198
1982	5333.1	5228.5	518.4	0.133
1983	5975.6	5858.4	572.5	0.090
1984	7226.3	7036.3	678.6	0.111
1985	9040.0	8270.8	786.9	0.103
1986	10308.8	9679.6	907.4	0.083
1987	12102.2	11278.8	1040.4	0.051
1988	15101.1	12711.3	1153.9	-0.019
1989	17090.3	14483.3	1294.7	-0.081
1990	18774.3	18209.8	1604.1	-0.045
1991	21895.5	21175.6	1840.1	-0.086
1992	27068.3	25440.2	2183.8	-0.089
1993	35524.4	30971.5	2628.2	-0.073
1994	48459.6	39048.9	3276.4	-0.015
1995	61129.8	52203.1	4332.7	0.111
1996	71572.3	66087.1	5427.9	0.192
1997	79429.5	77266.0	6281.4	0.201
1998	84883.7	85568.2	6889.9	0.161
1999	90187.7	91468.3	7301.5	0.088
2000	99776.3	99378.7	7870.7	0.031
2001	110270.4	109471.2	8607.2	-0.015
2002	121002.0	121916.4	9521.7	-0.054
2003	136564.6	134985.3	10477.0	-0.102
2004	160714.4	154711.6	11874.8	-0.118
2005	185895.8	182590.9	14005.4	-0.104
2006	217656.6	214503.4	16361.6	-0.092
2007	268019.4	255816.9	19411.2	-0.061
2008	316751.8	299217.6	22588.3	-0.043
2009	345629.2	348030.6	26142.9	-0.022
2010	408903.0	395763.6	29585.3	-0.016
2011	484123.5	459363.8	34175.5	0.019
2012	534123.0	520334.2	38523.4	0.039
2013	588018.8	573006.0	42214.1	0.039
2014	636138.7	623726.6	45718.7	0.036

数据来源:依据中经网数据统计库数据计算。

1.2 置于国际背景的中国经济增长分析

进行国际比较发现,继 2000 年我国 GDP 首次突破 1 万亿美元后,2009 年和 2010 年分别超越德国和日本。2014 年 636 138.7 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以美元计算首次突破 10 万亿美元,成为继美国之后又一个“10 万亿美元俱乐部”成员,GDP 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美国早在前于中国 30 年的 1970 年就达到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而到 2001 年才达到 10 万亿美元。从万亿到 10 万亿美元的跨越,美国耗时 31 年,而我国仅用时 14 年。2014 年日本名义 GDP 为 4.8 万亿美元,不及中国一半。

受益于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日益壮大的经济总量规模,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国



际影响力稳步提升。具体而言,一方面,以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继我国实际人均 GDP 分别在 1978 年和 2003 年突破一千和一万元后,2014 年进一步跃升至 45 718.7 元,换算成美元,显然已经高于世界银行划分为“上中等收入国家”的 4 056 美元标准。北京和上海等省份人均 GDP 甚至为 99 994.5 亿元和 973 70 亿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伴随着实际人均 GDP 衡量的经济发达水平逐步提高,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克鲁格曼认为“中国在近 20 年的时间里,其 10 多亿人口的收入提高了 4 倍。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在物质生活方面经历如此快的改善”。2014 年我国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0 167 元,扣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 8%。其中,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28 844 元和 10 489 元,比 2013 年实际增长 6.8% 和 9.2%。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持续增大,中国因素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关系中难以忽视的存在。我国在 2013 年就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外汇储备规模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位。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22 个工业大类中,中国在 7 个大类中名列第一,有 15 个大类名列前三。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2014 年中国经济增量对全球经济增量的贡献率为 27.8%,超越美国的 15.3% 居世界首位。从投资、贸易、就业和竞争力四方面量化分析,预计中国结构改革带动的经济增长,对 G20 实现 2% 额外增长目标的贡献率将高达 30%~40%。显然,中国已然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依托,我国正努力与世界各国建立互利经济合作关系,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和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和南南合作,在反恐、防扩散以及打击海盗等国际事务上发挥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负责任的建设性作用。

## 2 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的突出问题表征

综观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成功由“上中等收入”阶段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 70 个国家,平均用时 12 年又 4 个月。其中,人口超过 1 000 万的 20 个“人口大国”,平均用时 11 年又 9 个月。站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的新历史起点,在欣喜于我国巨大经济增长成就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长期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资源配置效率、要素积累、人口红利、外向势能趋向衰减的现实情况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累积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日趋凸显:资源、环境、收入分配等倒逼机制,促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规模速度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面临深度转型挑战。事实上,这提出应在关注经济增长数量和规模的基础上,更加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客观需要,并反映在我国学者的有关研究中。刘亚建<sup>[1]</sup>指出,经济增长速度反映的是经济增长总量变动,而经济增长质量的判断指标应是单位经济增长率所含有的剩余产品量。单位经济增长率中投入的资金物资越少,经济增长质量越高;高质量的经济增长率即使只表现为中速,也能使国民财富明显增长,质量低的经济增长率即使以很高的速度增长,其能满足的社会需要也不如高质量下的中速增长。陈丹丹<sup>[2]</sup>等通过研究提出有效的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质量变化的重要原因,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需要从制度方面加以型塑,逐步实现经济增长与质量提高进行同步。翁媛媛等<sup>[3]</sup>研究经济增长质量变迁路径和机理后发现,必须依靠生产效率提高驱动经济增长,这才是考虑增长质量的长期稳定增长模式。李斌等<sup>[4]</sup>研究发现,初级产品效益度显著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变动,转换贸易模式有利于改善经济增长质量,而扩大初级产品贸易会降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钞小静等<sup>[5]</sup>认为,在经济增长数量不断扩张的同时,还需要不断改进经济增长的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的统一。马铁群等<sup>[6]</sup>从经济增长方式质量、经济增长过程质量和经济增长结果质量三个方面构建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结果发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持续性和经济增长结果质量变化的贡献越来越大,而对经济增长协调性变化的贡献非常有限。马宇等<sup>[7]</sup>研究发现,科研投入对当期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将科研投入滞后一期变量和滞后二期变量引入模型,发现科研投入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随着时间延续逐渐减弱;将经济增长质量滞后一期变量引入模型,进行动态面板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科研投入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仍然显著。因此,增加科研投入



可以有效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上述有关研究文献,对于深入理解和评价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遗憾的是,这些文献都只局限于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特定方面,没有完整地给出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全貌。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数据,本文将从总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福利水平以及能源资源与生态环境等方面评价我国经济增长质量。

2.1 总需求结构失衡

总体而言,我国经济总需求结构呈现投资膨胀、出口依赖和消费低迷的失衡局面。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弱,而出国消费却不断攀升,使得我国经济发展缺乏持续、平稳增长的内在动力。

综合考察按照支出法计算的三大需求的 GDP 贡献率和增长拉动率,如图 1、图 2。1978 - 2014 年间,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增长拉动率总体上呈现波动性较低但不断下降趋势,与 1978 - 2000 年间平均 63% 的贡献率和 6% 的拉动率相比,2001 - 2014 年间下降到 50% 和 5% 以下;对应地,1978 - 2014 年间,投资和净出口则在波动性相对较高总体趋势下呈现出稳步上升和下降的不同态势。更具体地,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增长拉动率,在 1978 - 2000 年间平均为 28% 和 3.5% ,而 2001 - 2014 年间则达到 53% 和 5% ;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增长拉动率,在 1978 - 2000 年间平均为 8% 和 -2.7% ,而 2001 - 2014 年间则达到 0.4% 和 -0.1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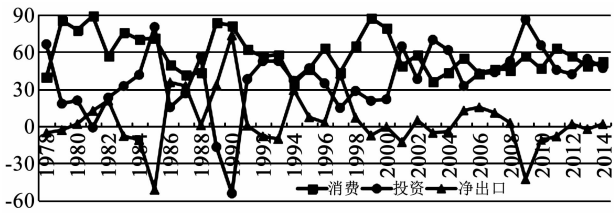


图 1 我国三大需求的 GDP 贡献率

数据来源: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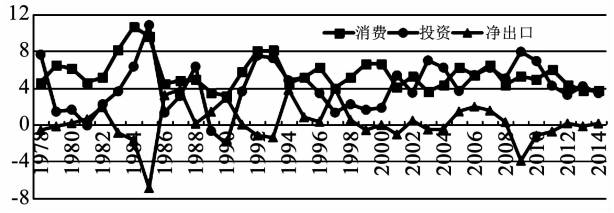


图 2 我国三大需求的 GDP 增长拉动率

进一步从消费角度进行分析,如图 3。1978 - 2002 年间,我国最终消费率基本稳定在 60% 以上的水平,2002 年以后,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继 2002 - 2006 年间下降到 50% ~ 60% 之间,2007 年后基本都维持在 50% 左右,2010 年更是下降到 47.4% ,创历史最低水平。从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个组成部分看(图 4),政府消费的最终消费占比由 1978 年 20% 左右,稳步上升至 2014 年的 30% 左右,而居民消费的最终消费占比则在此期间对应下降 10% 左右。其中,城镇居民消费的居民消费占比,由 1978 年的 40% 弱大幅上升到 2014 年的 70% 强,而农村居民消费的居民消费占比则由 1978 年 66% 大幅下降到 2014 年的 30% 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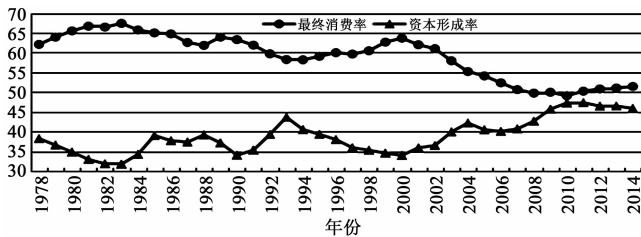


图 3 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与资本形成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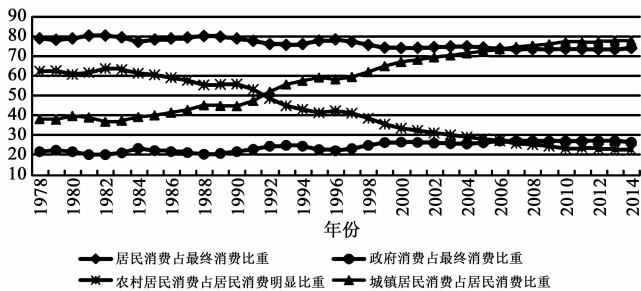


图 4 我国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变化

曾几何时,低消费率和高储蓄率是中国经济赖以快速增长的重要保障之一。但从长期看,消费对经济增长起着基础性作用。尤其在中国快速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后,消费率超过 60% 左右才能支撑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国际经验<sup>①</sup>,就变得具有更大的参考价值<sup>[8]</sup>。这不仅是因为,作为经济总需求组成部分中周期性波动性相对较小的部分,较高的稳定消费率可以很好地稳定短期经济波动,为经济均衡增长提供稳定的动力来源,而且是因为,与公民福祉高度相关,较高的稳定消费率和总体消费力才与经济大国地位匹配,符合保证人民公平和充分地分享经济改革发展成果的民生发展思路。当然,应该看到,我国长期以来的消费不足问题,背后是增长模式、收入分配体制、金融体制、社会保障体系、就业以及城乡社会结构等一系列体制性因素共同导致。

与消费率处于递减通道相反,我国资本形成率则走出稳步攀升态势(图 3)。1978 - 2003 年间,除 1993 年外,我国资本形成率基本维持在 30%~40% 的水平,但 2003 - 2014 年间,我国资本形成率跃升至 50% 左右,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大国资本形成率一般为 20%~30%,20 世纪 60 - 70 年代高速增长日本重化工业阶段也只有 32%。由此而言,资本形成率偏高是不争的客观事实。这是符合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要求投资率趋于上升的一般变化规律的。从国际经验看,东亚经济体的兴起就经历了高投资过程,注重发挥投资的创造需求和生产力的双重作用。

鉴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消费率低、出口受国际环境影响大等实际国情,尤其是经济新常态下的严峻压力,可以预见,短期内保持一定资本形成率仍很重要。但辩证地看,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其一,与消费波动相比,投资是 GDP 中波动最大的部分。经济衰退和过热时期,总支出波动通常是投资支出下降和增加引起的。由此,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容易加剧经济波动,伴随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等

①统计资料显示,1978 - 2008 年全球年均消费率、年均居民消费率分别为 76.55% 和 60.6%,其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年均消费率分别为 77% 和 74.4%,年均居民消费率分别为 60.5% 和 60.3%。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年均消费率分别为 83%、70.2%、78.3%、83% 和 79.8%,年均居民消费率分别为 66.9%、54.9%、58.5%、62.3% 和 56.9%。印度、巴西和墨西哥年均消费率分别为 76.7%、79.7% 和 77%,年均居民消费率分别为 65.5%、63.7% 和 66.7%。与我国 2000 - 2008 年经济发展阶段相同或相近的日本、韩国和西班牙年均消费率分别为 62.1%、71.3% 和 73.3%,年均居民消费率分别为 51%、59.9% 和 63%。详见文献[8]。



负面效应;其二,投资快速增长主要集中在工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等方面,高度依赖土地、钢铁、水泥等生产要素和行业,受制于土地、能源、原材料的稀缺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空间将会受限。投资结构不尽合理、低水平重复投资现象严重的情况下,不仅导致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而且也将拉低投资效率。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比较,我国相同的投资规模所获产能增加低 30% 左右。其三,在我国将投资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发展战略下,投资承担起经济增长的快捷引擎以及宏观调控的重要职能,由此使得我国的投资过程呈现出明显的政府主导或超强行政干预特征,并进而产生大量资源流向低效率国有经济部门的资源错配问题。生产率低、创新能力弱但具有垄断地位的“僵尸企业”难以淘汰,而生产率提高速度快、更具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受制于资源流动的体制障碍,潜在增长率难以提升,不仅会加剧制造业产能过剩,而且会成为短期经济波动和周期性失业的重要根源。

从净进口角度看,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长期实施的出口导向战略,在吸引国际投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和管理、弥补国内消费需求并进而提供经济增长动力源方面发挥不可替代作用。从绝对规模看,2008 年我国出口额和货物进口额分别达 1.4 万和 1 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出口总额的 8.9%,经常项



图 5 我国的外贸依存度

目顺差和外汇储备分别为 2 955 亿美元和 19 460 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尽管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 年我国货物出口额仍达 1.2 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由此相对,我国外贸依存度(也即货物进出口总额与 GDP 之比,如图 5)由 1978 年的 10% 单调递增到 2006 年的 65%,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融入全球化进程相契合,而 2007 年以来萎缩调整至 40% 左右,与其说是人民币汇率和国外需求影响的结果,毋宁说应该是未来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新常态。之所以如此判断,其一,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个经济体和第一出口大国,总体技术进步与发达国家差距缩小,成本低、风险小,见效快的技术模仿进步方式空间有限。不仅国际外部经济条件和偶然性突发事件,如金融危机引发的周期性经济波动、政治变动以及商业变故等,严重干扰我国宏观经济,造成我国经济波动剧烈,更遑论,针对我国工业生产和出口产品碳含量高,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及酸雨面积均居世界第一的状况,国际上兴起以环境、质量、安全和劳动条件等为手段的新兴贸易保护主义浪潮,限制中国购买石油、农产品、矿产及其他产品,调整进口关税,对中国产品征收所谓“边境调节税”、“环境和气候税”,并计划征收“碳关税”,严重威胁我国经济安全。其二,我国“大进大出式”粗放出口贸易模式难以为继。我国参与全球化产业的产业大部分处于国际价值链低端,国际分工地位低下,贸易出口结构不合理,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非核心部件制造和劳动密集的装配环节中,国内企业在价值链低端进行恶性竞争;出口产品自主知识产权含量低,品牌和营销体系缺乏,许多出口产品的生产过程消耗资源多、碳排放量高,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我国高速增长经济的收益中有相当部分经由资本收益、知识产权收益、品牌收益以及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收益流到国外。测算表明,我国 1 元加工贸易增加值拉动国内 GDP 仅为 0.3 元,而拉动国外 GDP 高达 0.7 元,中国出口贡献严重高估。另外,我国廉价成本竞争优势不断缩小,尤其是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明显,一些新兴经济体生产成本低于我国<sup>①</sup>,并能生产能替代中国的部分出口产品,大量在

①根据美国贸易谈判办公室数据,2009 年,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力小时工资为 1.07 美元,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和巴基斯坦分别是 0.35 美元、0.31 美元、0.22 美元、0.2 美元和 0.2 美元。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人口众多且年轻化程度高,其中,印度、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和巴基斯坦分别超过 10 亿、2 亿、1 亿和 1 亿,越南为 0.8 亿。



中国投资设厂的跨国公司已经开始向劳动成本更低国家转移,使得我国制造业面临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

随着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以及国民收入水平提高,我国消费模式也经历了“劳动密集型产品消费-耐用消费品消费-知识技术产品消费”升级,大规模工业化使各类物质商品消费接近饱和点,并进而受到消费需求制约而减速,导致供给结构无法满足消费需求端结构升级。巨大的资本驱动力导致我国投资持续高企以及向非生产性部门的过度分流,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一路下滑。与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相结合,又削弱人力资本增长潜力,导致人力资本配置低使用效率和严重扭曲<sup>[9]</sup>。由此,原有大规模工业化框架下的激励制度和生产模式,成为创新需求和转型需求的结构性和系统性障碍。所以我国亟须调整需求结构,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2.2 产业结构失调

总体而言,我国产业结构呈现三大产业比例失调、产业内部失衡并存的基本特征。就比例不合理的三次产业比重关系而言(图6),第二产业比重过大,长期以来位于接近50%的水平,第三产业比重过低,尽管2012年前一直处于攀升趋势但低于第二产业比重,远低于高、中低收入国家72.5%和53%的水平<sup>[3]</sup>。值得重视的是,2012年后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但经济减速、生产率下降的新常态下能否断言我国产业结构向好仍需谨慎。从三次产业经济贡献和经济拉动率看,如图7和图8,第二、三产业的GDP贡献率和增长拉动率都远高于第一产业,呈现出明显的工业拉动增长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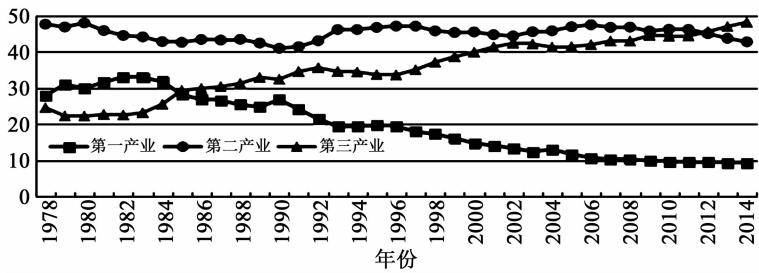


图6 我国三次产业占 GDP 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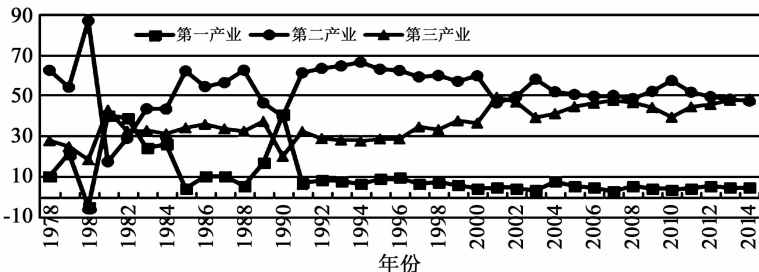


图7 我国三次产业的 GDP 贡献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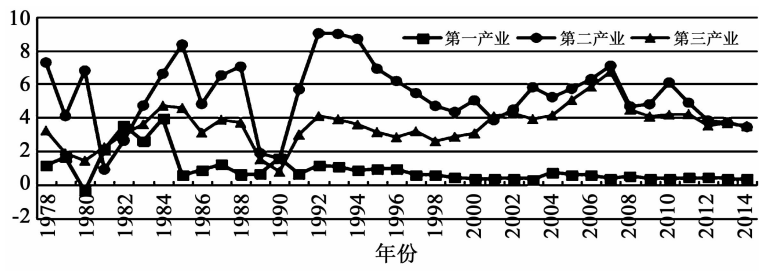


图8 我国三次产业的 GDP 增长拉动率



与三大产业比例失调相伴,我国三次产业内部失衡也较为突出。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劳动生产率和收益都较低的传统农业比重较高,现代农业发展滞后。耕地、水资源等对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约束不断强化,农业信息化、良种化以及农产品加工、营销、绿色基地和产品检测、监测体系等建设步伐远落后于发展需要。过度使用农药和化肥,与食品安全、绿色基地、农业新型化、产业化等目标和理念严重背离。

第二产业内部,占比超过 50% 的国民经济重点和优势支柱产业,多以高能耗资源型产业为主。其中,石油、天然气开采业产值占 GDP 的 2.8%,煤炭开采业占 5.38%,黑色金属及有色金属冶炼及加工占 11.6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9.44%,化学原料和制品制造业及其专用设备制造业 18.24%<sup>①</sup>;与之相对,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与产品创新程度低,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发展不足。科技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只有 20%,低于美、日等国 80% 的水平,高新技术成果商品转化率和产业化率分别只有 20% 和 7%,高新技术产业关联度低,增加值仅占 GDP 的 4%,远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sup>[10]</sup>。优质原料、核心技术、研发设计及市场营销等主要依靠国外。钢铁、水泥、煤炭、船舶、电解铝、平板玻璃等传统产业以及风电、光伏、多晶硅等新兴产业普遍陷入产能过剩,但我国特种钢材进口每年都在高速增加,多晶硅和光伏产业核心技术依然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纺织服装出口占全球纺织服装贸易总额的 24%,但自主品牌不足 1%,且没有一个世界名牌。我国彩电、手机、台式计算机、DVD 播放机等产品的关键芯片大都依赖进口,我国企业需将每部手机、计算机和数控机床售价的 20%、30%、20%~40% 支付国外专利持有者。

第三产业内部,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服务效率和附加值低。2010-2014 年间,交通运输、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传统服务业占到 35.14%,教育、科技服务类行业所占比重则较低,金融服务业仅为 14.74%,房地产业为 12.86%,物流服务业不足 16%<sup>②</sup>。有利于提升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研发与科技服务、设计、营销、金融、供应链管理、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与发达国家注重专门化分工与品牌培养,会计、审计、法律、咨询、价格评估等市场中介服务组织比较完善并在许多方面代替政府部分职能不同,我国缺乏规范市场秩序、促进公平竞争的现代服务业发展。

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因为持续、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是提高生产率。这不仅是因为产业结构制约经济增长模式和速度,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能推动技术进步,而且,产业结构也影响收入分配和需求结构。

### 2.3 居民收入差距带来福利水平非均等化

2003-2014 年间,我国居民基尼系数位于 0.469 到 0.491 之间,尽管从 2008 年最高的 0.491 存在逐步回落趋势<sup>③</sup>,远高于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sup>④</sup>,符合 0.4~0.5 国际标准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经济发展成果尚有待于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进一步分析发现,伴随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绝对收入水平也大幅增长(图 9),其中,2014 年分别是 1978 年的 83 和 73 倍。但城乡居民收入比在 2002 年突破 3.11 倍后长期稳定在 3 倍以上,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在 2008 年超过 1 万元后,进一步在 2014 年达到 18 583 元。与此对应,2003 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率基本维持在 30% 略低的水平,农村居民消费率则长

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2014)计算。

②同上。

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3-2014 年,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 0.479、0.473、0.485、0.487、0.484、0.491、0.490、0.481、0.477、0.474、0.473 和 0.469。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各级政府采取若干强有力惠民生措施,使基尼系数从 2008 年最高的 0.491 逐步回落。

④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09 年阿根廷、巴西和俄罗斯的基尼系数分别是 0.46、0.55 和 0.40,2008 年墨西哥基尼系数是 0.48,印度 2005 年的基尼系数是 0.33。



期处于不断下降趋势,在 1993 年达到跌破 20% 的 19.4% 后,进一步在 2007 年达到跌破 10% 的 9.1% ,2011 年达到最低的 7.9%。从恩格尔系数看,1978 - 2014 年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平均高于农村居民 6 个百分点,部分年份甚至达到 10 个百分点。若进一步考虑区域经济和行业发展差距,以及城乡二元结构情况下城乡居民医疗、教育、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巨大差距,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无疑将更大<sup>[11]</sup>,由此影响社会公众的经济增长福利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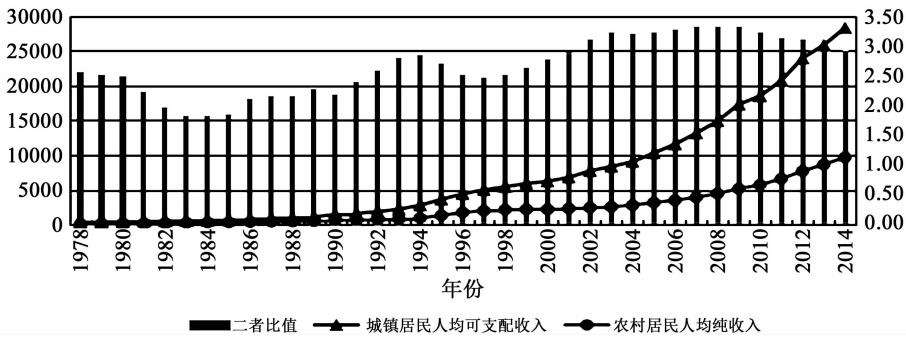


图 9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变化

概括而言,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大体源于劳动贡献差别(劳动努力和辛苦程度、个人禀赋、能力)、生产要素(主要是资本)占有差别、分配制度不健全(部分垄断性行业职工收入明显高于非垄断性行业职工收入)以及制度法规不规范等方面。其中,第一和第二类收入差别,会造成收入差距,但应该是公平、正义的,属社会公众可接受范围,但第三和第四类收入差别,应属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调整的。这有助于实现“物本之路”发展转变到“人本化”发展,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2.4 能源资源与生态环境压力大

受需求结构、三次产业及其内部结构制约,我国在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中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产生日益严重的高能源资源消耗、低能源资源效率、高污染、巨大资源环境压力问题。

如图 10,总体上我国单位实际 GDP 能源消耗强度处于下降通道,尤其是总能源标量(标准煤)和煤炭在 1997 年以来下降到 2 吨/万人民币水平后,又进而在 2009 年下降到 1 吨/万人民币。原油和天然气消费遵循类似趋势。前者在 1987 年下降到 1 吨/万人民币水平后,进而在 2007 年以来稳定在 0.1 吨/万人民币水平,后者则在 1990 年突破 1 立方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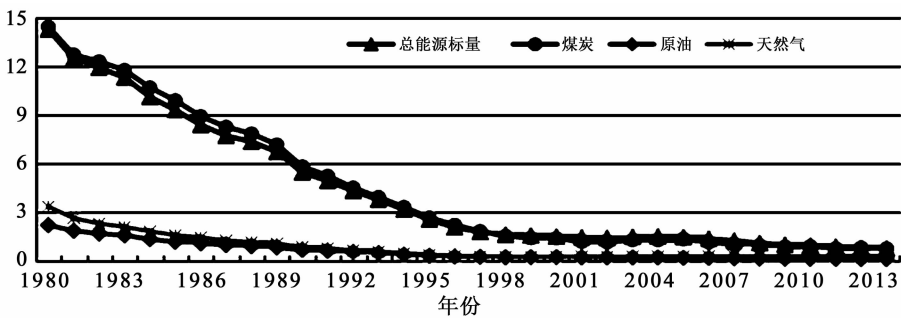


图 10 单位 GDP 消耗能源情况

注:1.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环境年鉴》计算。  
2. 除单位实际 GDP 的天然气消耗单位为立方米/百人民币外,其他单位均为吨/万人民币。

百人民币水平后,自 1995 年以来长期稳定在 0.3 立方米/百人民币水平。从单位实际 GDP 废物排放量看(图 11),废水、废气中二氧化硫和烟(粉)尘排放量以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也都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尤其是废气中二氧化硫和烟(粉)尘排放量。



因而,综合分析单位实际 GDP 的能源消耗和废物排放量,可以发现,我国经济的单位实际 GDP 能源投入效率在提高,而污染废物成本在下降,这实际上表明,我国长期以来实施的科学发展、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更进一步地,之所以中国经济饱受“高耗能、高污染”问题诟病,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在日益

壮大,因而健康成长的中国经济所需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总量已然接近能源环境承载临界。从生态环境看,我国化学耗氧量(COD)排放量居世界第一,超过环境容量 90% 以上;SO<sub>2</sub> 排放量是美国的 2 倍,酸雨面积超过国土面积 1/3;七大水系 50% 受到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段 90% 左右受到严重污染<sup>[3]</sup>;农村面源污染、生活污染突出,部分地区重金属污染严重。另一方面,我国能源效率和清洁排放水平还存在巨大提升空间。作为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费国,我国主要资源性产品消费占全球总消费比重,明显高于 GDP 占全球经济的比重,部分重化工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 10%~50%,矿产资源总回收率比世界先进水平低 20%。<sup>[12]</sup>2010 年,我国 GDP 约占全世界的 7.5%,却占世界能源消耗的 19.6%。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约占 GDP 的 32.6%,但能源消费却占全国能耗的 58%,钢铁、建材等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 10%~20%。<sup>[13]</sup>

### 3 新常态下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政策建议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近期面临经济增速、工业品价格、实体企业盈利和财政收入增幅下降以及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的“四降一升”的结构性矛盾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使用 HP 滤波估计产出缺口发现(图 12),2006 年以来我国产出缺口都为正,实际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与此对应,我国劳动力市场状况正常,失业率保持稳定。显然,新常态下经济由高速转向中高速增长,是伴随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出现的结构性变化。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长期以来,在政府的强势推动下,我国高度注重发挥消费、投资和出口等三个凯恩斯主义总需求因素拉动经济发展作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健全相耦合,我国经济增长呈现规模速度粗放型模式,需求结构失衡,产业结构失调,能源资源和环境代价巨大,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创新不足,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健康、可持续性,降低增长质量,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进而实现“两个百年”战略目标的现实制约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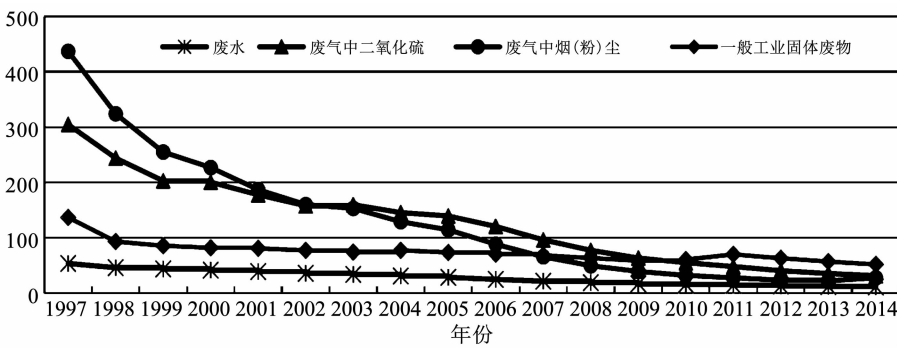


图 11 单位 GDP 废物排放量

注:1.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环境年鉴》计算。  
2. 除单位实际 GDP 的一般固体废物单位为吨/百万人民币外,其他单位均为吨/亿人民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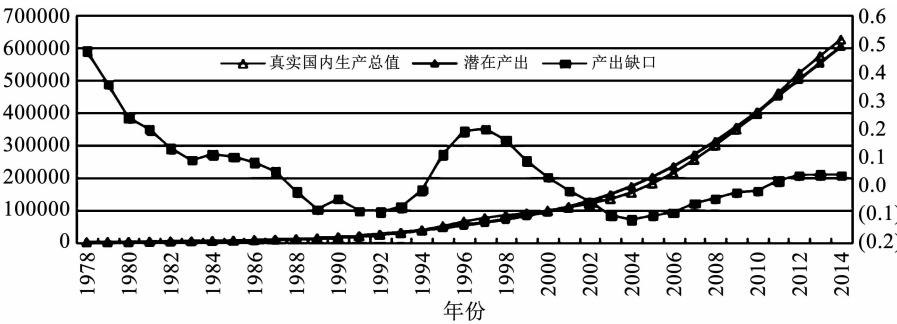


图 12 HP 滤波法核算的我国产出缺口



我国长期奉行的扩大投资、刺激需求政策,并没有抑制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发挥我国经济巨大潜能和强大优势,应遵循推动我国经济从粗放向集约、从简单分工向复杂分工的高级形态演进的客观规律。从规模速度粗放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要全面深化改革,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增强中国经济内生动力和政府强有力的政策引导。

### 3.1 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基于改革开放以来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历史经验<sup>①</sup>,我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认识深化以及表述转变恰反映出,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历史阶段,仍需针对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核心问题,采取有效改革措施,健全市场体系,培育市场机制,消除制约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诸多体制机制障碍。就提升我国经济增长质量而言,应遵循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一市场经济规律,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等问题。

具体而言,首先,将经济增长路径由政府投资、招商引资、放水漫灌强刺激、盲目扩建新城区以及为“僵尸企业”提供贷款和补贴等扭曲性资源扶持为主要特征的政府主导型,转变为政府引导下的市场主导型,将投资和消费主权还给企业家和消费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回归市场的发现价值功能及其内在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作用,让各类企业通过市场竞争实现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以及自身利益最大化,确保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等各种资源,按照市场价格信号反映的供求比例流向最有利的部门和地区。

其次,改革各种过多依靠行政配置资源的不合理扭曲性政策。坚持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原则,加快形成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消减政府对于水、石油、天然气、电力等关键投入要素以及交通、电信等领域的不当干预,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发挥市场在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和创新要素配置方面的导向作用。

再次,政府应着力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在明确政府权力边界、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将职责和作用转变到宏观调控、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市场监管、保护环境等上来。努力提高经营性国有资产以及矿山、森林、国有和集体土地等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使前者经由运营和流转实现保值增值,使后者实现市场竞争和有偿获取,为“僵尸企业”退出实物和信贷资源以及市场空间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 3.2 善用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干预宏观经济是必要和必需的。关键在于应提高政府干预的科学性,兼顾好提高宏观经济内在活力与克服短期宏观经济波动以及中长期供给侧政策与短期总需求政策之间关系。总体而言,作为凯恩斯主义总需求政策核心的政府可以强力推动所谓“三驾马车”进而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惯用措施,具有难以调整结构、持续性相对较差等局限性。在当前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形势下,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因此,应在适度扩大总需求、调整需求结构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致力于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以改革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sup>[14]</sup>,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为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我国需求结构需由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由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在消费需求方面,应以扩大国内需求为重点,稳定并提高以消费需求为主的国内需求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

①我国对于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认识和表述处于不断深化和变化过程中。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作用;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体制。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加快调整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失衡,逐步提高居民收入的国民收入比重,实现低收入群体富裕。深化国有企业利益分配体制改革,建立国有资产及其收益补充社保基金的长效机制。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投资方面,应控制政府直接安排项目投资的过快增长,引导服务业和公共事业投资,提高投资效率,调整投资区域结构,向高效集约型转变;按照结构性改革要求,通过功能性产业政策加以引导,避免政府直接确定具体项目和企业,使企业真正成为创造有效供给和开拓消费市场的经济发展主体。优化对外出口贸易结构,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增加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出口,严格限制“两高一资”商品出口,提升能源配置效率。

3.3 突出创新和人力资本驱动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巨大的物质产品需求和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供给支持下,使用相对容易复制的外部技术存量,我国就可以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机和激励。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伴随重工业化阶段的深入推进,我国从国外获得技术的可能性必然日益降低,学习曲线也逐渐接近 S 型顶部,带来投资及效率减速<sup>[15]</sup>。因而,技术进步越来越要靠自主研发和创新,而其恰在各种技术进步当中属于投入最大、周期最长、成本最高的。

提高中国经济质量的增长,就必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依靠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增加导致经济规模和经济总量增加的“外延型增长”,转变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引起的“内涵型增长”。因而,应使知识生产部门代替通用技术部门,使之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创新动力源。发挥知识生产部门的外溢性效应,使之抵消资本效率递减的负向冲击,提升资本质量,增进劳动力的消费和再生产能力。伴随通用技术生产部门结构优化升级,还可以发挥过滤掉低层次生产环节的生产模式“过滤效应”,支撑知识、教育、信息、创新、制度和范围等新要素成为报酬递增的来源<sup>[16]</sup>。

参考文献:

[1]刘亚建.我国经济增长效率分析[J].思想战线,2002,28(4):30-33.

[2]陈丹丹,任保平.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质量:理论分析与计量检验[J].当代财经,2010(1):17-23.

[3]翁媛媛,高汝熹.中国经济高增长模式的质量与动态效率判断[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9):5-14.

[4]李斌,刘苹.中国外贸发展方式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2(4):1-6.

[5]钞小静,任保平.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4):102-107.

[6]马轶群,史安娜.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 VAR 模型的实证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12(11):30-39.

[7]马宇,程道金,张卉云.科研投入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实证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5(2):45-52.

[8]周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公共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9]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中国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冲击与减速治理[J].经济研究,2014(12):4-18.

[10]王保安.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基本特征、深层原因与对策建议[J].财贸经济,2010(7):5-12.

[11]王永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测度与分解:1978-2010[J].当代经济管理,2015(11):23-28.

[12]李克强.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J].求是,2010(11):1-6.

[13]柳百成.“中国制造 2025”现状与思考[J].人民公仆,2015(4):8-15.

[14]龚雯,许志峰,王珂.权威人士再论当前经济形势,阐释如何深刻领会、正确贯彻中央经济会议精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N].人民日报,2016-01-04(1).

[15]张平,刘霞辉.中国经济增长前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6]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突破经济增长减速的新要素供给理论、体制与政策选择[J].经济研究,2015(11):1-11.